

不读本书，不品《水浒》，不知天下之奇！

水浒文化新解

黄霖



文化冲击 名家论谈 水浒新解 源远流长

一部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

一种热血与烈酒搅拌的文化

杨子华 著



水浒文化新解



杨子华 著

黄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文化新解 / 杨子华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228-426-5

I. 水… II. 杨…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8615 号

水浒文化新解

出版策划: 精典博维

作 者: 杨子华

责任编辑: 陈黎明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内文排版: 亿辰时代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张: 21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8-426-5

定 价: 3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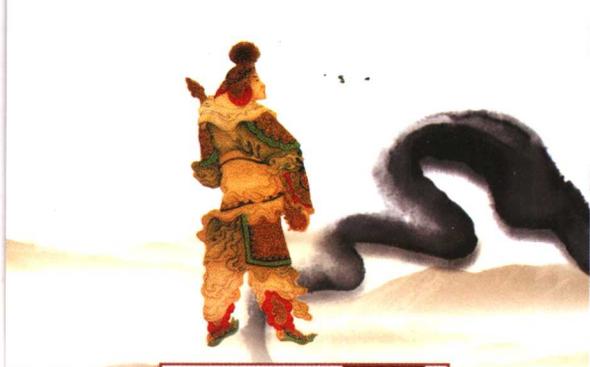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杨子华 男，1937年生，浙江嘉善人。中国水浒学会理事、学术委员，《水浒争鸣》丛刊编委，主要从事《水浒传》与《金瓶梅》研究。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责任编辑：陈黎明

互动博客：<http://blog.sina.com.cn/jingdianbowei>

封面设计：红十月设计室
 RED OCTOBER STUDIO
 13901105614
 hongshiyue@vip.sina.com



张国光

大家知道：《水浒传》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它的内容涉及到各个方面，因此研究它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所长，选择自己兴趣之所近，进入这一领域，勤学苦钻，惨淡经营，甚至穷年累月才能有所成就。而杨先生正是这样长期献身于《水浒传》的研究事业，而又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取得引人注目成就的一位。据我看来：他所取得的成就，集中表现在他对于宋元以来杭州的水浒民俗文化，作了广泛的探讨，发表过系列的论述，而现在仍然锲而不舍在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

杨先生研究《水浒传》首先是凭借了自己的特殊优势：这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南宋的故都杭州，并曾担任杭州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杭州曲艺志》副主编、《浙江曲艺志》编委。这样，他和杭州曲艺界就有了广泛的接触，因而对南宋以来杭州的曲艺颇有研究，曾发表这方面的论著四十多万字。杨先生还有不少机会听到杭州评话艺人说的《水浒传》，这为他后来研究杭州的“水浒文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他充分地认识到了今天杭州的评话乃渊源于南宋杭州的“讲史”《大宋宣和遗事》（详见杨子华著《水浒民俗文化》中的“流派纷呈的当代杭州评话《水浒》”）。除了《水浒传》与杭州的“讲史”即评话有一脉相承的直接关系外，其他如《水浒传》与杭州宋元的“说唱”、“舞蹈”、“相扑”以及话本小说等都有间接的亲缘关系。主要有这样六点：

1. 《水浒传》与宋元杭州的话本小说，有着极密切的亲缘关系，非但宋元时的杭州“小说”话本《武行者》、《花和尚》、《青面兽》等及“讲



史”《大宋宣和遗事》成了后来成书的《水浒传》的蓝本；为《水浒传》提供了人物的雏型和故事的轮廓，而且宋元杭州“小说”话本如《西湖三塔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郑节度使立功神臂弓》、《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的诗词多被引用到《水浒传》里去了。

2. 宋元时期杭州的说唱艺术如“小唱”、“耍曲”、“慢曲”以及“诸宫调”都被施耐庵，引进了《水浒传》。特别是南宋时杭州艺人张五牛创作的诸宫调《双渐小卿》都被施耐庵写进了《水浒传》，发展成了第五十一回白秀英演唱的诸宫调《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这一段情节。（详见《水浒民俗文化》中的“《水浒》与宋元杭州的说唱”）

3. 宋元杭州舞蹈艺术如元宵“舞队”中的《傀儡》、《舞鲍老》、《麻婆子》、《踏竹马》及《耍和尚》等，都被施耐庵吸收到了《水浒传》第六十六回。特别是《水浒传》第二十二回中还对《舞鲍老》有较为生动的描写。（详见《水浒民俗文化》中的“《水浒传》与宋元杭州元宵的‘社火’民俗”）

4. 宋元杭州的相扑艺术，也对《水浒传》中的人物和故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水浒传》中一些好汉的绰号出自宋元杭州相扑艺人的绰号，如病关索、云里金刚、铁臂膊等，而且如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的故事情节，也是从宋元杭州“小说”话本《杨温拦路虎传》中杨温与李贵的相扑故事发展演变而来。（详见《水浒民俗文化》中的“《水浒传》与宋元杭州的相扑、文身、蹴球民俗”）

5. 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主要运用的是杭州方言。这与宋元杭州的“讲史”《大宋宣和遗事》和今天杭州评话《水浒传》所运用的杭州方言基本上是相同的。再与今天还流传在杭州人口语中的方言相对照，从而进一步证明《水浒传》所运用的方言，主要是杭州方言。（详见《水浒争鸣》第六辑《从〈水浒传〉王婆说风情谈宋元杭州的方言》）

6. 《水浒传》第九十四回“涌金门张顺归神”这一回书，对西湖之赞美，作者又是引用多首西湖诗词，又是以“说话人”的口吻加以介绍，又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张顺的心理活动，多侧面地表达了作者对



西湖的熟悉,对西湖的热爱。(详见《杭州研究》2001年第3期:《施耐庵笔下的西湖》)再如《水浒传》第九十四回“涌金门张顺归神”到第九十九回“鲁智深浙江坐化”这六回书,总共花了十多万字的巨大篇幅,集中描述“杭州战役”的始末。(详见《杭州研究》2003年第1期《施耐庵笔下的杭州城门》)故杨先生特将这六回书称之为“杭州书”。第九十四回在描述西湖美景时共具体描写了二十多处西湖主要景点。在这六回描述“杭州战役”的过程中,共描写了杭州的城门、山川、寺庙、桥梁、村庄等一百多处,从地域的角度看,其描述达到了全面、具体、准确的要求。以上这些都可作为内证,证明《水浒传》确是杭州书会才人施耐庵所编撰。

根据以上六点,我们可以看到杨先生对于杭州与《水浒传》的密切关系,是作过广泛而细致的考察的。我们知道施耐庵这个人,胡适认为他是“乌有先生”,而鲁迅则认为他是“托名”,但经过杨先生的广泛搜集证据,多方面指出他对于杭州和西湖的景点是如何地如数家珍,而其描写又是那样的符合实际;这不是在历史上可能有一个钱塘施耐庵而且呼之欲出的证明么?

事实上杨先生也确实是这样看待施耐庵的。他在《水浒民俗文化》一书中首先肯定了《大宋宣和遗事》,确定了《水浒传》的根据地梁山泊,又提出三十六人及其为首人物晁盖、宋江,使整个故事情节,具有了《水浒传》的轮廓。他接着指山:“《水浒传》是一部在《大宋宣和遗事》基础上充分地发挥诗词……多种功能,从而形成了散文的叙说与韵文的诗词相结合的白话长篇小说。施耐庵几乎把南宋时一直流行于杭州的说唱艺术如:小唱、耍令、慢曲、诸宫调以及讲史(平话)、小说等都写进了他的《水浒传》中去。”

杨先生还抓住《水浒传》中描述白秀英所演唱的诸宫调一节,深入地探索下去。他写道:由北宋兴起的诸宫调,传到南宋的杭州以后称“南诸宫调”,盛行于南宋的瓦子勾栏里。特别是由于杭州艺人张五牛创作诸宫调《双渐小卿》使诸宫调更加风行。而“一生热爱和熟悉杭州



说唱艺术的施耐庵……采用了移花接木的创作方法，巧妙地把其转化为《水浒传》第五十一回诸宫调艺人白秀英演唱《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我们更加认为施耐庵必定是杭州书会中的才人，否则是不可能把白秀英演唱诸宫调……这段情节描写得如此细致、生动、逼真”。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杨先生进而肯定了《水浒传》的整理和再创作者就是施耐庵。他写道：“《水浒传》乃是集南宋以来杭州的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智慧之大成的集体创作，……由元末明初接近民间艺人、熟悉民间艺术的施耐庵整理并再创作……”

回忆杨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经写道：“我有鉴于很长一段时间，在《水浒传》研究中，特别是对《水浒传》的作者以及对《水浒传》语言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且颇多谬误，甚至还有造假的现象。因此，我努力既要吃透《水浒传》的原文，以研究《水浒传》原文为主；又努力联系实际，以在《水浒传》作者及《水浒传》语言等的研究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云云。

我认为杨先生这一段自述是实事求是的。他所开辟的这样一条研究途径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而且他在研究杭州自南宋以来的民俗文化方面也确实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相信广大的《水浒传》研究同行，都能通过阅读杨先生的这本新著《水浒文化新解》扩大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见闻，集思广益，以利于把新中国的“水浒学”的理论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最后我还得对于杨先生十分关心中国水浒学会的工作，不辞辛劳地参与《水浒争鸣》丛刊的征稿和编辑，以及校改文字的工作的积极表现，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杨先生在学术上青春常在！





李永祜

十余年前，一位青年同志出了一本名为《宋代城市风情》^①的书，主要是描写北宋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的饮食、技艺、婚俗、灯节等各种民俗文化。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不久前，又有一本由杨子华先生撰写的《水浒民俗文化》摆在了我的书桌上。这本书写的是与《水浒传》中描写有关的南宋国都杭州的饮食、说唱、技艺、节令、文身、相扑、蹴球等各种民俗文化。此书的出版不但使南宋国都的文化风俗状况得到发掘，补上了研究的空白，使人们看到了整个宋代南北两都的风貌；而且，将南宋国都杭州与《水浒传》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在发掘、研究宋代的杭州“水浒文化”。

杭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杭州是一方自然风光优美的胜地。杭州出现过许多历史名人，杭州也孕育出了一部杰出的古典名著——《水浒传》。

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有孕育它的生活土壤和文化氛围。水浒故事并非源出于杭州，但杭州却催化、孕育出了《水浒传》，因为杭州具备了促使这部作品问世的生活土壤和文化氛围。被称为“四大名著”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部作品，除《红楼梦》为文人独力创作外，其他三部作品的故事内容，都是先在民间长期流传，中经说话艺人的加工、讲说，最后由作家再创作而成为完整的作品。这就是说，这三部作品在成书之前，都有说话艺人讲说的基础。而杭州则是宋元两代说话艺人最集中、说话行业最兴盛的城市。可以说，“四大名著”中的前三部作品，没有哪一部象《水浒传》那样，有与杭

1



州血脉相连的那般紧密的关系；在当时的城市中也并没有哪个城市能象杭州那样，为《水浒传》的成书问世，提供了那么充分的条件。

杭州早在北宋时期就是一座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北宋灭亡，南宋定国都于临安即杭州。北方包括国都汴京和其他城市的说话艺人，大举南迁，流寓杭州的最多，使它的人口超过了百万。庞大的城市人口，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当时的杭州，店肆林立，海陆横陈，珠宝玉器、绫罗绸缎、日用百货、风味饮食、干鲜果品、花鸟鱼虫等各种商品丰盈充足，其繁荣之状况不亚于昔日的汴京。庞大的城市人口，特别是社会下层的群众，需要通俗易懂的说唱艺术满足自己的精神渴求，而遍布杭城内外的百戏杂剧演出场所瓦舍勾栏和数以几百计的说话艺人及其他艺人则不断地满足着广大市民的需要。杭州的这种经济、文化状况，就是催化、孕育水浒故事发展和《水浒传》成书的生活土壤及文化氛围。

历史上的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的活动，采用声东击西、飘忽不定的流动战术，实行狂飙式的突袭，使宋王朝官军防不胜防，经常遭到重创，引起了朝野的极大震动。尽管这支队伍人数不多，活动时间也不长就遭失败，而且北宋王朝也随即覆灭^②，但是这支队伍的极富传奇性、神秘性的活动和暴兴暴亡的命运，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下层人民群众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趣。因此，宋江等人的故事并未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消泯，而是在大江南北、城乡各地广泛流传，尤其是在作为江南实际上也是全国说话行业中心的杭州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宋江等人物作为说话的名目，首先出现在杭州。南宋人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记载，杭州说话艺术八个门类中就有三个有水浒故事中的人物。它们是“公案”类有“石头孙立”，“朴刀”类有“青面兽”，“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这四个人物都在宋江率领的三十六人之数。这四个人，很可能是罗烨对有关门类内故事名目举例的性质，实际上水浒人物也许不止此数。此外，在“杆棒”类内尚有“拦路虎”（全称应为“拦路虎杨温传”——引者）、“徐京落草”。这两人虽不属三十六人之内，却是后来《水浒传》中的人物——被朝廷派征梁山起义军的“江夏零陵节



度使杨温”、“上党太原节度使徐京”。这些人物作为故事题材进入说话行业，至迟不晚于南宋中期，即十三世纪初叶。

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完整的故事也首先出现在杭州。在现存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先后上太行山聚义，攻州掠县，与朝廷官军对抗，最后归降朝廷，平定方腊，加官晋爵的故事。这是迄今所知将三十六人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最早的水浒故事。它不但包含了后来《水浒传》最主要的人物，也具有了《水浒传》的许多重要情节，为《水浒传》奠定了基本的线索和框架。《大宋宣和遗事》是南宋说话艺人的一个提纲式的讲史话本底本。它开头小部分回顾了夏、商、周三代经汉唐至五代治乱兴亡的历史；主体部分则讲述自宋太祖开国直到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尤以讲述宋徽宗一朝腐败、奢侈，导致民不聊生，天下动乱，金人南侵，北宋覆亡为重点。作品在对徽宗及蔡京等权奸批判的同时，又充满了爱国抗金的民族感情。象这样的话本作品，自应是出于说话业中心的杭州说话艺人之手。这部作品后来虽经元人加工，但其主要部分仍保存了宋人的面貌。它编纂成书的时间至迟不晚于十三世纪四十年代。

杭州说话艺人对后来的《水浒传》所做的贡献并不只限于此，他们还还为《水浒传》提供了重要篇章。如《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的故事，研究者公认这是宋代说话艺人话本的遗存；又如第二十四、五两回，写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据笔者研究，这部分篇章也是宋人话本的遗存^⑥。再如第九十四回写宋江攻占秀州后分兵拨将准备攻打杭州，书中特别指出：“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留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虽然这里说的是“书会留传”，不是说话人留传，但在南宋书会的先生(或称才人)与说话人关系极为密切。他们是为说话人编写话本的人，其中有的人同时又是能登场的说话人。从这种关系上说，他们留传下来的篇章与说话人的遗留意义是相同的。值得我们重视的不仅是篇章的遗留，重要的是这些篇章所具有的艺术水平和作用。说话艺人由于其社会地位和职业特点，使他们接触、观察和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下层的各色各样



人物，也熟悉这些人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他们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经过精心的揣摩、构思，反复讲说和不断改进锤炼的功夫，创作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真实自然的生活环境。如“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描写得曲折生动，引人入胜；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刻画各色人物的心性举止、音容笑貌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描写人物的生活环境乃至生活细节，是那么得心应手、娴熟真切，这就使这些篇章成为描写社会下层尤其是城市下层生活面貌的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可以说，《水浒传》基本艺术风格的确定，与说话艺人刻画人物、表现生活的艺术方法和艺术技巧以及所运用的有浓郁地方色彩的语言是直接相关的。还值得重视的是，从这些宋代说话艺人遗留的篇章和未能确指但极有可能是遗留的其他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宋代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风土人情、里巷习俗的真实面貌。这是可以由宋人的笔记史料得到印证的。

当然，在《水浒传》与杭州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这部作品最后加工定稿者即作者与杭州的关系。

自明代中叶以来的私人笔记、书目著作和作品题署，多数都把施耐庵、罗贯中并列为作者。上述史料一致称施耐庵为钱塘人或武林人^④，有部分史料称罗贯中为钱塘人、杭人、越人。施耐庵的生平不可考。他很可能是宋末元初杭州的一名说话艺人，耐庵极可能是他的艺名(南宋说话艺人名中带“庵”字者颇多，见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也极可能是为说话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先生而又能登台演出者。正是施耐庵将艺人分头讲说的水浒故事话本按照《大宋宣和遗事》的线索和框架，过去粗取精、淘芜删杂的加工再创作的功夫，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极大地提高了作品刻画人物形象和描写生活环境的水平。他整理而成的这部《水浒传》最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被称为“施耐庵的本”。从作品中对江浙各地特别是杭州附近地理状况描写的娴熟和准确看，明人认为他是杭州人的说法是可信的。罗贯中是《水浒传》的另一位作者。他的最大贡献是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加强了对宋王朝最高统治集团黑暗、



腐败的揭露和批判,并将大团圆的结局改为悲剧结局,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震撼力量。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本系山西太原人。他很可能客居杭州时间较长,杭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以致同时代人和后代的人均认为他是杭州人。这与唐代诗人李白长时间寓居山东因而被后人认为是山东人相类似^⑤。施耐庵和罗贯中经过加工再创作,将《水浒传》定型成书,应是在杭州完成的。这样说,我想不会远离事实。

总之,《水浒传》从它问世之前的水浒故事讲说、话本的出现直到作者施、罗最终再创作成书,始终与杭州血脉相连,息息相关,两者有着难分难解之缘。如果说以梁山、郓城等地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是水浒故事的故乡,那么,杭州就是水浒故事发育、成熟并最终成为杰出作品的温床和摇篮。

一部杰出的作品赖以孕育、生长的生活土壤、文化氛围和作品问世后围绕它衍生出的物质的、文化的现象,人们称之为作品文化。人们对《水浒传》问世后衍生出的小说、戏曲、曲艺、评话、绘画、建筑、工艺品等《水浒》文化并不陌生,不少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人们对《水浒传》赖以孕育、生长、成熟的杭州地区宋元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氛围这部分《水浒传》文化则知之不多,学者们也缺乏研究。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方面长期沉寂的局面已经打破,杨子华先生开始了对历史上的杭州“水浒文化”的探索和研究。

我与杨子华先生相识多年。初次相会,我就觉得他为人朴素、敦厚、正直、热情。交往既多,更发现他执著于学术研究,热心学术活动,并具有埋头苦干、勇于奉献的精神,因而在交往中我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子华先生近年常住北京,我们在聚谈时经常交换学术信息、交流学术观点,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彼此成为学术上的好朋友。但更使我欣赏的是他在学术上执著、踏实的探索精神。在当前学术界急功近利、浮躁、伪劣、不良学风盛行的情况下,这种甘坐冷板凳、踏实做学问的作风是可贵的。子华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就潜心研究南宋的杭州文化,特别是在说唱艺术方面,已发表了有关小说、唱赚、诸宫调、陶真、南词、杭滩、杭曲等曲艺文章数



十篇,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子华先生生于浙江,长期工作、生活于杭州。他热爱杭州的山川文物,他对杭州的了解自然比外地人具有优势。事实上,他早年对南宋杭州文化的研究已经是触及了《水浒传》的历史文化。近年来,他明确地将《水浒传》与南宋杭州文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探索,提出了“杭州水浒文化”的命题,并已发表了系列论文。

子华先生的这些论文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在掌握丰富、翔实的材料的基础上,对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例如《水浒传》中,张顺的绰号为“浪里白跳”,“白跳”的意思甚为费解,而且与作品中描写张顺在水中泅游时,“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的状态不相契合。杨子华先生根据《水浒传》第四回中对张顺的赞语:“人将张顺比,浪里白跳鱼”和杭州方言有“白条儿”的词语,以及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有一位瓦舍艺人绰号叫“白条儿”的记载、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诸色伎艺人”条也有一位艺人绰号叫“一条白”的记载,断定这“浪里白跳”应为“浪里白条”,是宋元“说话艺人口头说讲过程中音近而误”造成的。这个见解是合理的、正确的。又如,《水浒传》中把杨雄、孙立、薛永的绰号分别称作“病关索”、“病尉迟”、“病大虫”,作品中还以“面貌微黄”、“微黄面色”、“淡黄面皮”这样的描写,对“病”字作出了解释。但这种描写又似与他们的剽悍勇猛的性格、举止相矛盾。杨先生根据《大宋宣和遗事》,龚圣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杨雄的绰号均称“赛关索”,宋元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描写一个卖酸馅的小业主王秀“这汉走得楼阁没赛,起个浑名,唤做‘病猫儿’”。断定,“病”与“赛”同义,是并比,媲美之意。这个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它解开了几百年来的疑团。类似的例证书中多多。

其实,诸如《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宋元笔记史料,均为研究者人所共知,不同的是杨先生把这些史料与杭州的方言、民俗和《水浒传》连贯起来进行深入思考,因而比别人先行了一步,得出了新认识。

现在他将系列论文结集《水浒文化新解》一书,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会引起学术界人士的关注和兴趣。



风景优美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既是中国的,又应是世界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既要让我国人民更加了解和喜爱杭州,我们也应当让世界人民了解和喜爱杭州。宣传杭州,发掘、阐释这座优美悠久的历史名城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着手。如今,杨子华先生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切入,对与《水浒传》血脉相连的南宋杭州文化的探索已做出了良好的开端。我希望杭州和浙江有更多的学术界朋友,发挥自己“近水楼台”的天然优势,关注和投入这方面的工作。

2006年3月7日

注: ①伊永文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据史料记载,宋江起义约发生于宣和元年(1119)。宣和三年春(1121)在海州中张叔夜埋伏之计,力尽而降。近年新发现的北宋末年李若水《忠愍集》中的“捕盗偶成”和李纲的《赵忠简言行录》均记载了宋江的投降。这一问题已无可争议。宋江降后六年即1127年,北宋灭亡。

③详见《水浒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前言》。

④杭州古称钱塘,明清时杭州府治所亦在钱塘;杭州府下属之杭县有武林山、武林水,而灵隐、天竺诸山亦总称武林,故杭州又别称武林。

⑤中唐时诗人元稹所撰《杜工部墓系铭》中称:“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著称。”五代时后晋刘昫所撰《旧唐书·文苑列传》称:“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





茶文化

茶 坊:《水浒传》中描写的王婆茶坊 /2

点 茶:王婆点茶,点的是什么茶 /6

侍 者:茶坊里的服务员——茶博士 /10

酒文化

酒 店:《水浒》所反映的宋元酒文化 /14

望 子:宋元时酒广告——望子 /24

商业文化

集 市:《水浒传》描写的商业集市——早市 /30

小 贩: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烧饼吗 /35

民俗文化

元 宵:宋元元宵灯节的灯景 /40

具有象征意义的灯景——鳌山 /46

元宵节馈赠妇女的“节物”——闹蛾儿 /50

元宵灯节的“灯词”/53

中 元:中元之夕放河灯 /62

中 秋:中秋节应景的流行歌曲《水调歌头》/68

